广泛凝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共识

□ 朱香敏

第1落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的科学概念,对待新质生产力,既不能囿于旧的思维惯性滞后于形势变化,也不能一哄而上流于泡沫化和盲目蛮干。只有在历史与逻辑、国内与国际、现实与学理的贯通中更加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特征,才能更加深刻理解这一新的"术语革命",凝聚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定自觉和社会共识。

把握"新"和"质"

从语义学的角度讲,理解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新"和"质"这两个字。新质生产力的"新",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新质生产力的"质",包括质态、质量、质效。"新"是动力、是源泉,"质"是本体、是结果,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是辩证的、互洽的,其内在关系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以新促质,二是以质领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前提在"新",根本在"质",目的是"生产力"。

所谓"新",是指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的一般意义的生产力,而是由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既有着技术和业态模式意义的创新,也有着管理和制度意义的创新,是以新的技术应用、新的生产要素、新的要素组合等为主要支撑的生产力。

首先,运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与之前的生产力样态相比,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和"颠覆性"技术支持。如果说以蒸汽磨取代手推磨、以电子技术取代电力技术、以信息技术取代电子技术是划时代的、颠覆性的,那么,今天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所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来说同样是划时代的、颠覆性的。

其次,增添了新的生产要素。回顾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在农业社会,形成生产力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在工业社会,形成生产力的主要要素进一步扩展为土地、劳动、资本等。在信息化社会,生产要素又进一步增加了数据等要素,要素的范围再次扩大,要素的类型更加多元。

最后,形成了新的要素组合。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其生产要素的多寡,也取决于在一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技术既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也是对其他要素的组合具有催化作用的复合要素,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土地、资本等重新组合并产生"1+1>2"的效应。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说,就是要在给定要素供给的基础上,依靠要素组织、技术等变革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并以此形成产品或服务的产出增量。以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产主体,更加注重平台建设和生态构建,致力于打造开放、共享的生产和创新生态系统,使得生产主体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连接和协同。建立在数据技术应用基础上的工业互联网导致企业生产流程发生改变,生产的智能化、供应链的柔性化以及研发的协同性不断增强,平台经济成为改变企业生产以及供求对接方式的新型业态。

所谓"质",是指新质生产力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形成了生产力的新质态,从而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和更高水平的先进生产力迈进。

从人的劳动看,由体力劳动为主向脑力劳动为主转变。劳动者是整个生产力发展中最革命的因素。传统劳动力主要是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则是进行复杂劳动、具有高级技能和快速知识迭代能力、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驾驭现代先进设备的新型人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生产环境中迅速调整、创新和应对挑战,其视野、知识、能力、本领得到极大拓展和提升,劳动者的能力发生质变,呈现新质化劳动技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劳动者的定义。

从劳动资料看,由一般机器为主向智能机器为主转变。"劳动资料是人们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其核心是劳动工具。随着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传感器、自动装配线、工业机器人、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设备等成为新型劳动资料,智能技术可以进行计算、识别、决策等信息处理活动,在"无人车间"或"无人工厂"中由机器自动完成生产过程,既极大地提升了劳动效率,又能把人从机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质生产力中的强大算法展现出劳动工具的智能化水平,计算机的算法越强,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越高。

从劳动对象看,由有限的物质实体为主向无限的新型对象为主转变。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碳纳米材料、仿生材料、光电子材料等新材料,以及大量可无限循环利用的信息和数据。其中,新能源、新材料可以克服传统能源和材料储量不足、不可再生、环境破坏严重的缺点,有效减轻环境负担,并在开发过程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激发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信息和数据资源越使用、价值越大,且不会受到时空限制,经过有效搜集、整理、分析、挖掘和处理后,可释放巨大的生产力效应。

概括起来说,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是在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摆脱了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高碳排放的传统经济增长范式,以新一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和先进制造、生命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作为新的增长引擎的生产力,是能够深刻塑造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的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面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力。

透视新特征新趋向

新质生产力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二者有着发展脉络的内在联系,但更有着质的意义的内在差异。综合考察实践中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在发展理念、技术含量、要素配置、融合程度、生态效益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新趋向。

发展理念新。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其本质上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原则和灵魂。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贯穿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实解决影响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高质量发展。

技术含量高。新质生产力是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的必然产物,其根本驱动力就是科技创新,天然就带有高技术含量、高创新优势的基因和特征,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生产力。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处于重要突破关口,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脑科学、干细胞等领域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等技术创新更加密集,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机器人、新材料等重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呈现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与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多领域技术交叉融合创新层出不穷,新兴技术将对世界产生颠覆性影响。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围绕具有先发优势的潜在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推动一大批先进和前沿技术尽快涌现、不断产业化并赋能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其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是与各种产业结合最为紧密、在新质生产力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新技术。

要素配置优。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科技、金融、人才、数据、信息等一系列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素组合方式发生积极变化,要素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带动产出效益、生产水平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实现质的跃升。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内在要求科学技术、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数据信息等高端要素与现代产业发展方向相协同、相匹配,并且尽可能扩大资源要素的协同范围,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标准制度型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要素配置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融合程度深。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背景下,不同技术、不同要素、不同产业之间的渗透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首先,产业融合日益成为现实。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打破传统行业壁垒和技术壁垒,使得产业边界日益模糊甚至消失,推动不同领域交叉融合并发展出新的产业形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源泉。比如,通过技术渗透、产业联动、链条延伸、内部重组等途径,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最终实现产业交叉融合和新模式新业态培育。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够催生众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增量空间。其次,协同聚合日益成为常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巨平台+海量小前端"成为新型分工形态的全新载体与重要依托。聚合模式作为"平台的平台",在实现生产方式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对超级平台而言,平台企业的进驻能够为其增加消费场景、补充用户数据,完善业务生态;对平台企业而言,超级平台能够为其导入流量并提供品牌、资金、技术等支持,进而实现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最后,新技术新应用深度嵌入新产业新业态。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正在嵌入各行各业,打破了原有行业的边界,不同行业之间通过业务交叉、数据联通、运营协同等形成新的产业融合机制和社会协同平台,由此产生数字生态中的产业生态。产业生态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而成的新的基本经济单元,有助于推进资源整合、激发创造活力,实现系统集成、资源互联共享。

生态效益好。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是兼顾发展与保护、重视生态平衡的绿色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注重经济效益,也更注重生态效益、生态属性。其通过运用数据、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生产要素,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注重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普及,促进社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新质生产力由掌握绿色技术、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的劳动者,清洁生产的机器化体系等劳动资料,绿色原材料等劳动对象作为构成要素,是绿色理念得到普及、生态价值充分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和谐、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更加注重系统发展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有利于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走上要素投入少、配置效率高、资源消耗低、环境压力小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办公室主任)

开准纠治政绩观偏差的药方

□ 张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关键在于摸准干部政绩观的脉象,找准政绩观发生偏差的症结,开准纠治政绩观偏差的药方,认准政绩背后的隐患,培育干部"甘为、愿为"的动力,激发"想为、敢为"的勇气,提升"能为、善为"的本领,使落实改革取得工作实效,让人民群众真实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站稳人民立场,健全政绩观培育机制,解决为谁创造政绩的问题。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在长期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标准之下,有的干部只追求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严重脱离群众需求;有的干部则是眼睛向上只看官位,对待群众感情十分淡漠。防范和纠治这种政绩观定位不准的价值偏差,一是要健全理论学习机制,通过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宣讲、主体班次培训、重点对象培养和民主生活会培训等方式,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贯穿干部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二是要健全党性教育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才能确保政绩观的方向不出偏差。三是要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机制。干部要深入基层、融入群众,将群众的实际感受、切身需要和长远利益作为党政领导干部业绩实不实、好不好的衡量标尺,才能不慕虚荣、不务虚功,切实作出让人民满意的政绩。

强调实干实绩,形成政绩观引导机制,解决如何创造政绩的问题。业绩都是干出来的。新征程上,许多工作都存在着"一难、两难、多难"的复杂问题,党员干部则面对着"既要、又要、还要"的高标准。一些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能力不足"不善为";有的干部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不高,不拿好处不干事,对待某些"没有油水"的工作就开始动力不足"不愿为";有的干部工作上啃不了"硬骨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担当不足"不敢为";还有的干部不顾实际盲目蛮干,举债搞"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等,部署不足"乱作为"。防范和纠治这种政绩观不会作为、不善作为的实践偏差,一是要建立调查研究的工作机制。干部要直插现场、直面矛盾,真正弄明白群众需要什么、期盼什么。组织、部门则要深入基层,在面对面访谈、实打实剖析中真正发现干部政绩观存在的问题、理解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存在的顾虑,解决践行政绩观存在的困难。二是要加强履职能力培训和提升机制。组织、部门要精准对接干部专业化、差异化履职需求,帮助干部掌握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实践本领,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的担当,在真干中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三是要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机制。干部在任期内的政绩要经得起当下看、回头看、往前看,切断敷衍了事、卸任即卸责的后路。真正有效的政绩要能够持续发展、有始有终,防止新官不理旧账的后顾之忧,避免政绩半途而废,成为"烂尾工程"。

优化考核标准,健全政绩观评价机制,解决如何衡量政绩的问题。政绩的丰富内涵决定了政绩考评的复杂性,只有多层面、多角度、系统化搭建考评体系,才能考准考实干部政绩成色,使考核成为引导政绩观的"风向标"。当前,政绩考核尚存在重当下轻长远、重显绩轻潜绩的标准问题,设立隐形台阶、论资排辈的提拔潜规则问题,只在年底总结或干部调动时考核的频率问题以及党委、组织部门主导的单一化问题。这就导致有的干部不顾客观发展规律透支式堆砌政绩,有的干部一门心思搭关系找门路代替政绩,还有的干部数据造假伪造政绩。因此,防范和纠治这种政绩观只唯上、不唯实等导向偏差,一是要健全综合指标评价机制。要围绕党中央部署的核心任务,集成制定政绩观检视"正面"与"负面"两个清单,专门制定关键指标和重点任务"潜绩"与"显绩"两本台账,让干部的工作看得见、摸得着、有标准,政绩观不断具象化。二是要健全常态化考核机制。政绩观往往蕴含在干部事业发展、成长周期全过程,必须坚持动态跟踪,打破"不到年终不考核""不动干部不考核"的思维定式,建立起定责、观效、亮绩全过程跟踪纪实的考核机制。三是要健全多元参与、双向互动的考核机制。组织部门的政治能力评价、所属部门的业务水平评价以及人民群众的真实业绩评价都是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考评工作要坚持党委领导、组织考察、部门评价、群众参与,才能确保客观公正,使干部认同标准、积极作为。四是健全干部选拔机制,大力选拔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坚决不用那些政绩观不正的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使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实干者实惠,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

加强内外监督,完善政绩观责任机制,解决如何激励政绩的问题。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党员干部勇立潮头,但是,有的干部的思想认识仍然没有与时俱进地转变过来。有的干部不是奋发有为、积极担当繁重的发展任务,而是以纪律严了、干事难了为借口,遇到矛盾和困难绕道走、躲着走。还有的干部信奉"枪打出头鸟",信守中庸之道,不率先突破,不积极作为。防范和纠治这种政绩观消极懈怠的态度偏差,一是要健全重点部门干部监督考察机制,加强对政绩的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和审计监督,对"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和统计造假等问题和相关党员干部严肃追责、坚决清理,以组织"动真"推动干部"真动"。二是要健全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保护机制,深刻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探索建立重大创新、重大改革事项容错预审报备机制,完善澄清正名和诬告陷害责任追究机制,持续激发党员干部"愿为"的动力、"敢为"的魄力、"善为"的勇气。三是要健全干部政绩情况报告机制、领导干部履职用权风险评估与提示机制,综合运用列席会议、巡察反馈、审计约谈、线索核查等方面成果,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有效压缩错误政绩观的滋生空间。

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如此,才能培养出着眼改革创新的"生力军",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动力和长效支撑。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让金融活水赋能科技创新之路

□ 常晓君 彭红枫

■推动科技创新尤其是"硬科技"领域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但科技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传统金融体制难以匹配其需求。因此,要实现科技创新体系的质的提升,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强调了金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这一政策导向体现了科技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也体现了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意义。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不仅是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柱。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科技实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尺。中国要在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实现自主突破,支撑高质量发展,这一现实决定了科技创新必须成为引领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任务。然而,推动科技创新尤其是"硬科技"领域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但科技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传统金融体制难以匹配其需求。因此,要实现科技创新体系的质的提升,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

摸清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主要挑战

在当前建立与科技创新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过程中,中国虽已取得了斐然成绩,但科创资金供需不匹配、资金运用偏离既定目标、政策引导机制不足等多方挑战依然存在,削弱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力度。正视当前科技创新与金融体系间存在的主要现实问题,是建立相应体系、支持其发展的重要一步。

一是科创资金供需不匹配。科技创新的投资回收期通常较长,且投资收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与传统金融行业追求"短平快"和高确定性的目标存在冲突。因此,金融机构往往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而科创项目又普遍需要较高投入,从而导致科创资金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首先从评估体系来看,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授信机构通常依赖稳定的风险评估体系和可预测的现金流模型进行相关业务处理,但科技创新项目的回报受市场需求、技术成熟度、政策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较大,难以适应传统的评估标准。其次从财务数据来看,大多科技创新企业处于初创或成长期,缺乏充分的历史财务数据,传统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其长期价值,往往采取保守态度,对科创项目支持的信心缺乏,难以提供必要的灵活性和长期承诺。最后从项目生命周期角度来看,科技创新项目具有"早期高风险、发展期低风险"的相关特征,而传统金融机构在项目早期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支持不足。随着科创项目落地成熟,传统金融机构才倾向于提供支持。这种风险偏好的错位导致传统金融机构的支持难以覆盖科创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二是科创资金运用偏离目标。科技资金的实际运用与预期支持目标存在显著偏差,主要表现为企业未将所获资金充分用于科技创新项目研发。当前,企业在科技专项资金使用中的效率低下已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障碍。一方面,部分金融机构在科技资金使用的跟踪和管理上不到位,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企业的道德风险也使资金运用偏离了创新研发的核心目标。部分企业通过虚报资金需求获取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甚至将研发专款挪用于非研发活动或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资金运用的偏差不仅削弱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初衷,也加大了相关风险敞口。

三是政策引导机制不足。除传统金融机构工作问题、企业个体管理问题外,相关引导政策与机制的缺失是当前阻滞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又一问题。现行政策对于科技创新的鼓励力度有待加强,政策理念、定位不能灵活适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最终导致政策协调配套不足、决策机制与政策执行标准以及资金统筹不到位等问题,进一步影响了科技创新资金的有效配置。

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

针对上述科创资金供需不匹配、资金运用偏差、政策引导机制不足等问题,为了实现金融资源对科技创新的精准支持,保障科技资金的高效运用,亟须进行系统性改进。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以期破解科创资金支持中的核心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

建立多维动态评估体系,提升科创融资精准度。为改善金融机构对科创企业的评估适应性,应构建多维动态评估体系,综合考虑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政策支持等因素,减少对财务数据和短期回报的依赖。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可以与科技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合作,建立涵盖技术创新水平、团队背景、市场应用前景和政策支持力度等多维度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科创项目的成长潜力进行全方位评估。可引入"项目专家评审"机制,通过聘请技术、市场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科创项目进行综合评估。此外,动态评估体系还应包含定期跟踪机制,评估科创项目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评估结果。

推行项目全周期披露制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为应对企业在科技专项资金使用中的低效问题,建议建立项目全周期披露制度,对获得科技金融支持的企业实施资金流向分阶段公开,确保资金真实用于研发项目。具体要求企业在项目的关键节点,如启动、中期评估、阶段性成果发布等时点,披露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研发进度和初步成果,并接受第三方审计。监管部门可要求银行、创投基金等金融机构定期核查资金流向,以便及时发现异常资金流动或偏离研发方向的情况。此外,利用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对资金流转进行实时监控,形成资金用途的完整追溯链条,保障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优化科创政策激励,强化创新资金保障。为提升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应建立与创新成果挂钩的政策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更好地对接科技创新资金需求。政府可设立"创新激励基金",对高科技含量高、成功实现产业化的项目予以奖励,对积极支持科技创新、风险控制效果好的金融机构提供适当补贴或税收减免。此外,可推动出台"创新收益共享机制",使金融机构在科创项目成功实现产业化时,享受一部分创新带来的收益,增强其对高风险项目的支持意愿。对于投资早期高风险项目的金融机构,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性补贴或损失共担机制降低其财务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赋能科技创新已初见成效。根据工商银行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截至2024年6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已接近3.1万亿元,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接近2.1万亿元,较年初增加超3300亿元。山东省政府亦高度重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9月,全省科技型企业的贷款余额已达到1.2万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高于各类贷款的3.1个百分点。金融体系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未来的工作中,各级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增强科技型企业的信贷供给能力,完善科技担保和保险体系,加强科技创业投资运作,强化资本市场激励,构建"政银担投"多元支持机制,构建科技金融良好生态,以及完善支撑保障机制。通过提供财政资金、银行贷款、融资担保和产业投资的一体化配置,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为科技进步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